

深读·特稿

河流锐减
是不争事实

3月份刚过完,汪永晨和她的媒体同仁在云南分别,回到各自工作生活的城市。离别时,每个人的相机里,都装满了十八天以来拍摄的干枯河床、大坝对江河山体残酷伤害、河水严重被污染的照片。

年近六十的汪永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也是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

2006年,绿家园发起了名为“江河十年行”的活动,每年都会召集二十多位媒体记者和专家学者,去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及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六条江河的固定河段进行考察。

八年来,他们用镜头和纸笔关注江河、记录江河。每一年,六条江河被破坏的场景和干涸的河床,都会让他们触目惊心。今年的江河行从3月16日开始,历时18天。

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仅有2.3万条,对于这一统计数据,汪永晨的第一反应是,“减少的大河,只会比这多,不会比这少。”

在这队长期关注中国河流状况的媒体人和专家眼中,近年来中国河流急剧减少是不争的事实。

相对于大江大河,小河流往往不会受到过多的关注,但它们的存在同样意义重大。

与汪永晨他们不同,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教授阮宏华关注的是城市内的河流。

早在2005年,阮宏华和他的团队经过对比1994年和2004年的卫星照片,发现在这十年间,南京的20条河流完全消失了,全长超过15公里,包括进香河、内秦淮河北段、清溪河、上新河等。

“旱季时,河流的水位会下降,周边河滩露出大半,人类就开始向河滩进军。雨季水位上涨就开始筑墙挡水,土坝不够就用水泥坝、水泥墙,慢慢地,河流失去了自身的净化功能,一有污染,河水就会恶化发臭,大家就赶紧把它盖起来,甚至填埋起来。”

在阮宏华看来,城市里的很多河流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消失的。“河流是陆地上的血脉,跟人体的血液一样。河流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

2012年7月,北京众多路段被暴雨淹没,各大城市不断出现内涝。在阮宏华看来,城市里河流减少、水系被破坏,是其重要原因。

最后一条
天然生态的大江

2003年的一天,汪永晨接到了国家环保局一位司长打来的



▲3月,云南省禄劝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之间的金沙江,岸边蓝色的房子都是采矿、洗矿厂,污水直接排进金沙江。汪永晨 提供

消失的河流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3月26日,中国水利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仅有2.3万条,比此前长期沿用的5万多条的统计减少了一多半。

在长期关注中国河流状况的媒体人和专家眼中,近年来中国河流急剧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河流消失的原因很多,水电站的过度建设、地下水的大量开采,对于河流的不重视,却是主要原因。

面对河流的消失,我们需要做的很多,但推动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的民主程序,却是至关重要的。

电话,她被告知怒江上建大坝的规划就要被批准了。这位司长希望呼吁大家共同努力,留下中国最后保持天然生态的大江。

随后的十年间,怒江上修大坝的计划不断被提出来,在汪永晨他们的“死磕”下,又一次次被放下。

八年的江河行,让绿家园的成员们不断看到大坝造成的生态破坏。江边本来覆盖着绿色植物的山体,因为修建大坝直接被破坏,以及引发的泥石流和滑坡破坏,土层和岩石凌乱地裸露在外。

面对不断消失和遭破坏的河流,在2009年江苏省政协常委会上,作为民盟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主委,阮宏华提出了保护和修复“水岸带”。

作为水体和陆地之间的缓冲区,由草、树木、灌木等组成的“水岸带”,具有过滤、沉积陆地流下来的污染物以及净化水体的作用。阮宏华注意到,如今江河湖泊周围的“水岸带”越来越少,河岸湖岸往往被水泥砌起来,这加速了河流的消失,也对“水岸带”的两栖动物和鸟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今年3月,“江河十年行”队员们的车辆走在怒江边,不断有石头从高处滚落在车上,有两股泥石流还把他们夹在了中间。“我去了十三四次怒江,每次都这样。”汪永晨无法想象,怒江峡谷作为全世界地质最活跃的地方,修建大坝将对这里的自然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

2013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称,中国在“十二五”将积极发展水电,怒江水电基地建设赫然在列,其中重点开工建设怒江松塔水电站,包括深入论证、有序启动怒江干流六库、马吉、亚碧罗、赛格等项目。

经过对六条江河进行了8年的考察,看到水电站对于河流整体环境的破坏、对于水中生物多样性的毁灭、对滑坡及泥石流的诱发,汪永晨他们并不认同上百米高的水坝产生的水电是清洁能源的说法。

“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2010年12月,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作出这样的表态,也正是出于上面的原因。

信息公开
是更好的保护

除了持续跟踪六条大江同样的路线以外,“江河十年行”也跟踪了江边的十户人家,队员们忠实地记录下了因开发水电,当地人产生的矛盾、冲突与纠结。

这次“江河十年行”,在金沙江旁边的云南省黄华镇,队员们见到了给因溪洛渡水电站移民的居民的房屋。三层的房屋只盖了一层,便强制移民搬进去住,搬进去再盖上面两层。当着队员们的面,移民们拿起盖房的砖,轻轻一磕,便断为两段,用脚一踩,便成为碎片。

在汪永晨看来,在江河上修建

水电站的移民成本太低,修建后获益丰厚才是在大江大河上修建大坝最直接的动力。

汪永晨觉得,在怒江修不修大坝这件事情,也见证着绿家园作为NGO(非政府组织——编者注),不断呼吁的政策公开、民主和透明。这些年的历程,汪永晨选择用曲折迂回来形容。低谷是大型水电建设之前,罕有听证会召开;进步则是因为公众和媒体的呼吁,怒江上建水电站的计划被拖了十年。

绿家园通过发动媒体对江河的关注,还曾叫停几个违规在建的水电站,并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公众对西部江河生态的关注。

“现在水污染了,国家给一大笔钱,治理污染;泥石流来了,再给一大笔钱治理灾害,全是国家买单。而发电获的利,是水电集团的,这么多不公平的东西,来维持一个所谓的清洁能源。”

“我想,不从大的发展思路去改变的话,我们只能是保护一两条江;如果我们呼吁的是一种民主的程序:信息公开,公众参与,那样才能真正起到监督、良性发展。”汪永晨说。

“我和永晨说:我们不能老凭一种朴素的感情,一种义愤,做一个愤青。我们要站得住,从国家法律的角度,从环保科技,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参与程度要纵深提高。”在汪永晨2010年写的名为《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的书中,国家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在寄语中这样写道。

(上接B1版)

有新闻发言人将王勇平的经历上升为非典之后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影响最大的事件。培训课上,课程内容是讨论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种种失误,课下,却常常是同行们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和慨叹。

“王勇平现象的尴尬,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尴尬,由此带来的浅层命题是:发言人究竟怎样走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它的深层发问是:发言人身后的制度保障是什么,它到底能走多远,走到何种程度?”武和平发问。

新闻发言人
更应成为一种职业

王勇平的继任者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韩江平,从2011年8月上任开始,没有开过一次发布会,就连春运也没有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直至今年全国两会上原铁道部被拆分。

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因为媒

体记者对韩江平太过陌生,竟然争相追问末代铁道部长盛光祖,王勇平离职后,铁道部为什么再无新闻发言人?盛光祖对此解释,铁路有些领域专业性比较强,以后涉及哪个领域,就由哪个领域部门负责人来讲。

王旭明觉得盛光祖的回答并不妥当,“中央文件里从没见过工种复杂的部门可以不设新闻发言人,再说很多部门都很复杂。”王旭明说,这个回答让人充满“隐忧”。

2008年7月,当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职位时,毛群安给他发去信息:你终于逃离苦海了!而王旭明回:能者多劳,继承我的“遗志”,继续干好吧。

3个月后,毛群安也离开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岗位,虽然未脱离宣传传工作,却是从台前转入幕后。问及卸任时的心情,毛群安笑得爽朗而轻松:“解放了嘛。”

2012年4月底,担任发言人时间最长的武和平正式退休,到公安部文联工作,可以彻底实现他的作家梦了。退休后的武和平谢绝记者

采访,专心写书。

至此,在中国现代新闻发言人史上最辉煌、最有名的“三剑客”全部谢幕。

而王旭明在书中曾提到,根据材料统计,“黄埔一期”中,仅有三成多被提拔。

在2012年的统计中,“黄埔一期”里只有6人继续担任原单位发言人,离开者大多数是平调或退休。

而“名嘴”们的归宿,总会影响着后来者的足迹。

王旭明离职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曾感叹:“像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其实是可以干一辈子的。”

但王旭明毕竟没有干一辈子,他还是回到了体制内。这也是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的归宿。

王旭明曾总结,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四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四是来源于新闻媒体的领导。

这种情况也在改变,一些开放的政府和部门,越来越热衷从新闻媒体中选拔新闻发言人。比如在4月5日上海市召开的H7N9禽流感新闻发布会上,走上台前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就有媒体从业经验。

但在目前的中国,第二和第三种仍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主要来源。而在体制内运行的新闻发言人,衡量他们的工作成绩以及奖励的标准依旧是单一的,那就是:升职。

王旭明自问:新闻发言人是官吗?然后他自己回答:是官,也不是官。说他是官,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中,发言人是一级政府部门的官员,有行政级别;说他不是官,是说新闻发言人这个官的职责很特殊,他对外要与媒体、公众以及整个社会打交道,对内要与自己所供职部门的官员们打交道。这一特殊的职责要求决定了发言人在很多方面必须以官员的身份讲话,而又不能以纯官员的身份讲话。

官员讲究的是低调少说,而好

的新闻发言人却要求高调多说,这就犹如两条永不相交的线。

“在国外,新闻发言人是种职业,而非职务。”王旭明曾设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也成为一种职业,有资质,甚至可以分级,在一个单位干得好,可以跳槽到另一个单位,级别可以随之提高到处级、局级、厅级甚至部级,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却不变;如果干得不好,可以降薪、降级甚至取消资质,这样,一个新闻发言人就可以干到退休,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毛群安说,他现在再去给新闻发言人上课,技巧问题讲得越来越少,更多是讲如何完善新闻发言人这项制度。

“当年我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时,曾给自己的表现打分,谦虚一点是60分,自恋一点是85分。”王旭明半开玩笑地对齐鲁晚报记者说:“可看现在的一些新闻发言人表现,如果我再给自己打分,谦虚一点是85分,自恋一点是95分以上,哈哈。”